

# 三个意象与上海时期 鲁迅“革命观”的精神结构

杨 姿

**内容提要** “蝙蝠”、“勃兰特”和“告警者”三种意象的产生,同鲁迅在上海时期接触的社会情形、思想生态以及个人的精神结构调整密切相关,它们作为鲁迅自我评价的一种符号化体现,客观上也是鲁迅为文行事的参照与要求。三个意象前后相继地出现,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生关系:从蝙蝠洞察黑暗的独特方式,进而引申出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从勃兰特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得出革命手段的运用原则;从告警者参与革命的动机和行为,看到革命队伍建设的危机。三个方面共同形成了鲁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个性阐释。

**关键词** “蝙蝠” “勃兰特” “告警者” 上海鲁迅 革命观

杨 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210097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401331

1927年至1936年,鲁迅生活的上海是多种社会思想斗争激烈的场所,一方面国民政府为实施一党专政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另一方面,寻路的共产党人在种种封锁中正积极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置身复杂的社会环境,现代知识分子必然做出符合个人价值观念和民族利益的抉择,鲁迅的思想发展也受此影响,后来评价其政治倾向与之不无关系。但鲁迅对共产主义的选择或实践,又同那一时期以及成为执政党后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有着差异,这种区别可以从鲁迅对自己的三个称谓窥见一斑,也可以作为理解鲁迅完善主体精神结构的特殊方式和具体内容。

## 一、“蝙蝠”

鲁迅曾在多篇文章里提到蝙蝠。早在1919年5月,鲁迅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以蝙蝠自况。当时,傅斯年称赞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鲁迅表示:“《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单见蝙蝠能干干了。”<sup>[1]</sup>语虽谦虚,但对勤劳的蝙蝠显然是感觉亲近的。30年代初,鲁迅为声援黎烈文而“准风月谈”时,也曾写有专文《谈蝙蝠》,文中说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11&ZD114)阶段性成果;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民信仰建构”(120208C)阶段性成果。

[1]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sup>[1]</sup>后来在《门外文谈》中,鲁迅也说:“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但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sup>[2]</sup>这两篇文章前者说蝙蝠的“异端”性,后者说蝙蝠的难以“归类”性。从鲁迅的表达语气来看,鲁迅不仅以蝙蝠自况,而且还是很乐意别人给予自己蝙蝠的评价。这显然是因为,鲁迅自信自己比起年轻人来,更善于在黑暗中穿行,窥视和洞察黑暗中的各种行径的秘密,而且鲁迅也自认为自己在当时的“革命时代”里属于革命的异类,总是不合时代、发出“异声”,批判革命对象的同时又批判革命本身。

“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把重心安排在“光明”和“未来”,本质是典型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在此观念下,革命被视为一次性完成的历史任务,革命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因此普罗文学对革命的判断带着理论的、实验的性质。鲁迅在“天演论”时代就摆脱了纯粹科学理性设计的客观进化之路,当他预感到时代即将进入遽变期,也难持革命的片面乐观,而指出“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所以,文艺应该以独有的“重压”<sup>[3]</sup>关注这个时代。与之相应,他的“革命文学”逻辑也立足于:“揭出黑暗”和“揭出存在”。“现在”的“黑暗”首先来自于统治者,鲁迅披露了一系列“假救国”现象:《沉滓的泛起》里面借抗敌大做出卖旧货的广告;《以脚报国》里面留学生粉饰太平,掩盖国内兵、匪、穷、灾各种祸乱;《新的“女将”》里面以军装和武器装点女性,再以“女将”来装点看客的战场;《“非所计也”》里面鼓吹“私人感情”是中日外交解决方案,称“上京请愿”爱国人士“自行失足落水”是“非所计也”;《观斗》里面“军阀们只管自己都争着…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斗争”;对内忽战忽和,对外“不抵抗”,《航空救国三愿》里面兜售航空奖券,强迫民众缴纳飞机捐,却不知道“炸弹会不会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整个社会表面上一派积极向上、团结抗战的风貌,内底里竟是这等腐朽、积弱,鲁迅以“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总结那些蒙蔽群众,美化政治,自相矛盾的言行。揭示虚假抗敌,从表面看来与国民政府为难,如果仅仅把这个当作鲁迅走向无产阶级队伍的佐证,无异于把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界定为政治斗争。鲁迅之所以提醒国民从各种以救国为幌子的骗局中,看穿那些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地榨到自己手里的伎俩,目的在于引发国民对革命泥沙俱下情势的识别,这恰恰是鲁迅自身对革命的警惕和甄别。

此外,“现在”的“黑暗”也存在于革命阵营内部。鲁迅还讽刺了一系列“伪文艺”现象:《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里面谈到自称“革命文学”的仅仅是“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一味推崇“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客观”就是“楼上的冷眼”,同情也不过是“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里面揭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是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目的在“为殖民地上的洋大人效劳”,“流尸文学将与流氓政治同在”;《不通两种》里面批判“第三种人”和“民族主义文学”,“上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艺术’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他反驳王平陵所讲的“通话”事实就是“官话”,而不为官话代言的写作就如“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对革命阵营的划分,鲁迅并不是沿用社会通行的某一政治思想,而是看其是否真正实施革命主义。因此,他既不信任标榜革命的执政府,也不被革命文学派的言说所迷惑。

这与鲁迅的革命观察密不可分。单就广州这个“革命策源地”来说,也是顷刻间就变为“反革命”根据地,他在反思中意识到几个问题:第一,革命的领导者是否可信?他指出“革命巨子”只看重“自

[1]鲁迅:《谈蝙蝠·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2]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3]鲁迅:《〈尘影〉题辞·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1页。

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sup>[1]</sup>,他们既有着“阴阳脸”,又眷恋着“咖啡店”,仅仅是“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就算“超出了时代”<sup>[2]</sup>。第二,革命的依靠者是否可信?民众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被赋予主人翁身份,却唱着显示“小巧的机灵”和“厚重的麻木”的“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的太平歌诀,任何一个革命的时代,都有看客,他们的心理和形态如一,看“头”和“女尸”的“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sup>[3]</sup>。第三,革命的主义是否可信?他看过了“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回顾从“儒”到“侠”而至“强盗”的革命之路,然而这种“不满”从来都不是要做“主人”,而是要做奴隶主或受奴隶主庇佑的“流氓”<sup>[4]</sup>之流。所以,做“蝙蝠”就意味着鲁迅始终以怀疑的态度来面对革命的领导者、依靠者以及革命诸学说,无论是对“无产阶级文学”还是非“无产阶级文学”,鲁迅评判的标准不在于是否挂了革命的“匾”,而在于有没有充分地正视“现实的黑暗”,做真正的反抗。

蝙蝠形象诞生于黑暗之中的明察,鲁迅自谓蝙蝠,更侧重对黑暗的辩证认识,既包括社会革命所抵抗的黑暗统治,也指符合历史潮流意义的革命中的阴影部分,后者强调了革命未完成状态和行进方向。鲁迅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看到:革命一开始并非所有战士都“意识”正确,而是“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但只要是进行中,“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sup>[5]</sup>。鲁迅没有特指正确意识是“无产阶级”意识,但肯定了意识的进化,这种进化不同于外来强力征服而被动改变的发展,而是个体意识的主动性发挥,并集束为一种合力的作用。革命意识不是来源于教条,却实实在在来自于革命主体的参与和体验,反过来又促成革命队伍的进化,这是革命的形成过程,也是鲁迅对自己早期进化思想的实践与整合。从文化哲学的层面来看,鲁迅的进化思想建立在个体价值的抽象性上。他认为尊重个性的殊异,就不应该以多数为标准,以英哲来迁就庸众势必引起社会退步。而上海时期的鲁迅,不再把天才和诞生天才的土壤绝对对立,已经承认转化的可能性,使得他不再是简单地复述“文学革命”时代对旧文化、旧传统的抨击,而是在社会层面、行动层面上再来看待这个“思想层面”的积弊,有了阶级思维和辩证逻辑后鲁迅获得了比先前更自由、更深刻的认识事物方式。因此,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转”以后生硬地使用“艺术的武器”时,鲁迅并没有单一地占有那个理论武器,而是充分地融入个人生命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联,从而培养了一种独立的信仰方式和新型的话语系统,既没有将文化使命和价值情怀悬挂起来,也兼顾了群众感知和社会功用。

## 二、“勃兰特”

回忆韦素园的文章里,鲁迅怀念起易卜生笔下的一个人物——勃兰特。勃兰特在易剧中企图用个人力量鼓动人们反抗世俗旧习,他带领一群信徒上山寻找理想。在途中,其他的人难以忍受登山之苦,反而对勃兰特产生怀疑,并将他击倒,最后勃兰特在雪崩中丧生。易卜生的戏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推动过思想革命的发展,大批青年受其感召鼓舞,勇于追求个性解放。勃兰特作为一个悲剧人物,极度真实地演绎了对信仰最彻底的坚守,在被背叛的境地中,成为理想主义的献祭。勃兰特既符合鲁迅早期崇奉的超人英哲标准,同时还具有投身现实社会的实践,所以并不仅仅是“黄金世界”的偶像,而成为韦素园真实人生的一个写照。鲁迅写《忆韦素园君》的时候,心境早已不激昂,“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

[1]鲁迅:《通信·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2]鲁迅:《太平歌诀·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3]鲁迅:《铲共大观·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4]鲁迅:《流氓的变迁·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5]鲁迅:《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炼,然而中间混着血丝”,透露出对旧时的嫉恨与无助,但他却对这种牺牲精神充满激赞。一篇悼文处处能看到鲁迅的夫子自道。一方面,深知为国族前途和个人信念工作会遭遇误解和陷于困境;另一方面,即使“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重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sup>[1]</sup>,鲁迅也不以此否定心中的信仰,而是将勃兰特作为自己的影子。

按照鲁迅的理解,从现实革命的角度来讲,勃兰特作为牺牲意象隐含着不计得失的奉献,但又与成仿吾等人机械运用革命理论要求的献身有所区别。鲁迅说“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认为“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但这种活,不是苟活,他自己曾表达过“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牺牲准备。这种牺牲,一是不问报酬,不以交换为目的,二是不畏树敌,因为“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sup>[2]</sup>。融入牺牲观念的“战斗”不是左联时期的“飞车集会”,也不是暗杀等激进的革命手段,鲁迅的战斗始终以手里的金不换为工具,落实到翻译和实施大众语的身体力行中。

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启迪科学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唤醒灵魂的《默》、《漫》等,回到国内后又译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作品作为改良民族性的精神资源,尤其是接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后,着手翻译卢那卡斯基《文艺与批评》、蒲力汗诺夫《艺术论》、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录及决议的《文艺政策》、片上伸《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等一系列唯物史观著作。而鲁迅翻译遭受谴责声不断,从翻译观念、翻译方法、翻译心理等多方面对他进行文字责难和人身攻击。先有梁实秋、赵景深、杨晋豪等人“顺而不信”的反驳,后有穆木天等人的“围剿”。穆木天发表文章指责楼适夷借用“滥下注解”翻译观念形态不同的、反动的作品,他指出革命的翻译家应该翻译革命的、进步的内容<sup>[3]</sup>。鲁迅则强调翻译也需要“知己知彼”,并举“砒霜”为例,“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穆木天这样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sup>[4]</sup>即为证。他希望批评家“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sup>[5]</sup>,这样才有利于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可以看出鲁迅对未成熟的翻译工作充满怜惜,他甚至以只要没有“穿心烂”的苹果,剝掉烂疤,还可以吃得几处没有烂的,正如“拾荒”一样的譬喻来婉劝批评界对成长中的译者施以鼓励。对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把“间接翻译”称为“投机取巧”、“滑头办法”、“避难就易”,鲁迅则说“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即能不能“显出前一本的优良”<sup>[6]</sup>。而穆木天把鲁迅的“重译”称为“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并认为鲁迅是“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sup>[7]</sup>,鲁迅则回应“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sup>[8]</sup>。无论哪一种辩解和论述,鲁迅对翻译的态度都是肯定多于否定,支持多于批判。他认为“介绍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便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急于事功或故意迁怒,只会导致“买空卖空”,精神上的“聋”,文界上的“哑”,如

[1]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68页。

[2]鲁迅:《关于妇女解放·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5页。

[3]穆木天:《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1933年9月9日《申报·自由谈》。

[4]鲁迅:《关于翻译(上)·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5]鲁迅:《关于翻译(下)·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6]鲁迅:《论重译·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

[7]穆木天:《论重译及其它(下)》,1934年7月2日《申报·自由谈》。

[8]鲁迅:《再论重译·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4页。

同用秕谷来养青年,决不会壮大,只会出现尼采所描写的“末人”<sup>[1]</sup>。围绕翻译的种种分析、论争、呼吁、倡议,反映出鲁迅对事物发展认识的辩证思想,不走结论性套路,更关键的是体现出他在接受无产阶级理论之后自我评价和大众评价的调整: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建立在先觉知识分子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上,隐含着不易觉察的精英思维,而从翻译事件来看,对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都以宽容的态度扶持,并且对意图否定和压制翻译的批评界给予奋力抵抗,没有丝毫的“超拔”姿态,而是平民化的、初学者的倾向。

三十年代,鲁迅响应“大众语”运动,大力提倡“汉字拉丁化”:像日本文那样留少许汉字,大多数用拉丁拼音写,最后改作横行。今天反观他的建议,有不周全的地方,但回到历史语境会发现鲁迅所谈到的“大众语”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使用者的身份问题。在《门外文谈》中说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和“神秘性”,士大夫阶层为了要把持文字,故意使文字难以学习,不易普及,于是大众要想取得平等权利,在经济限制之外还多了一条文字难的高门槛。鲁迅把中国文字称为“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sup>[2]</sup>。汉字的拉丁化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指出汉字就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sup>[3]</sup>,从地方的到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必须依靠汉字的拉丁化,既节约时间又省却纸墨,这是一种和现代文明接轨的意识,同时“把文字交给一切人”,也是废除等级化的第一步。鲁迅认为,阻碍大众语实施,不让百姓享有平等的文字权,等同于“用飞机掷下炸弹去,用机关枪送过子弹去,用刀斧将他们的颈子砍断”这样的苛酷摧残。而由谁来实施?“活的东西——谁来做——觉悟的读书人”,没有受到旧文字污染的“刚健,清新”对应新生活的“彻底,平等”。从“文言时代”进入“白话时代”,这个过渡反映封建思想和民主思想的斗争,而由“白话文”走向“大众语”,一方面有文言遗老的反对,另一方面还有白话建功者的诘难。文公直说鲁迅提倡“语法的欧化”是投放“文化的毒瓦斯”,他甚至疑惑鲁迅是不是“敝国人”。鲁迅对国民最深切、最朴实的体察和保护,拼尽全力为反抗等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思想被误解为“对全民族的出卖”,猜疑成“为西人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但鲁迅坚持“全照老样”就不能“前进”。他曾以“别一个窃火者”形容自己不可躲避的境遇:“并不是锁他在山巅,却秘密的将他锁在暗黑的地窖子里,不给一个人知道。派来的也不是大鹰,而是蚊子,跳蚤,臭虫,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皮肤肿起来。这时还有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脚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来证明他是怎样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sup>[4]</sup>这一段自画里面显示出鲁迅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为着民族更广大群众的“前进”坚定地 and 一切压迫与残害的现象做斗争。

应该说鲁迅牺牲观建立起来的文学实践,已经褪去了早期思想中那种高蹈的,易于产生群众精神隔膜的成分,渐渐转向紧贴大众生活,与国民根本命运相关又往往被革命者忽略的实践。当然,这也符合他一贯的文化革命观的方向。在此牺牲观中,第一,鲁迅明确了牺牲的奉献对象,即中国几千年来受尽文化奴役的底层人民以及在革命运动中缺乏文化支撑的进步青年。并且他还指明了文化改造的现实途径与可见目标,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当时并不完备革命大纲的补充;第二,鲁迅对牺牲主体有了更为准确的引导,为牺牲提供了一种非革命主流的理解:一方面,不“以得到目前的安宁为满足”<sup>[5]</sup>,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应有不满足的彻底性,另一反面,即便是成功后也并非有面包或民众的拥

[1]鲁迅:《由聋而哑·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页。

[2]鲁迅:《汉字和拉丁化·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4页。

[3]鲁迅:《关于新文字·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4]鲁迅:《别一个窃火者·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

[5]鲁迅:《文艺与革命·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戴,祛除名与利的牺牲观斧正了革命的动机和目的;第三,鲁迅就牺牲的方式做出特殊的辨析:对青年的血感到痛心和震惊,同时,也看到牺牲者难有应者,“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sup>[1]</sup>,进而以许诺的赤膊上阵白白送死表达自己对壕堑战的认同。有保留的牺牲观和差异化的牺牲观,客观上区别了无价值的流血,但从精神道义上来看,鲁迅始终肩负着牺牲的使命意识,并且以牺牲保证其信仰的践履力。

### 三、“告警者”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的《序幕》有一段启示录:“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sup>[2]</sup>鲁迅由此联想到“丑角”的“打诨”便是“帮闲者的伎俩”。在《帮闲法发隐》一文中鲁迅说有一个人,“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但帮闲者就以丑角身份出现,用打诨和装着鬼脸,“使警告者在大家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并且“耸肩装穷,以表现对方之阔,卑躬叹气,以暗示对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这告警者原来都是虚伪的。幸而帮闲们还多是男人,否则它简直会说告警者曾经怎样调戏它,当众罗列淫词,然后作自杀以明耻之状也说不定。周围捣着鬼,无论如何严肃的说法也要减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却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它呢?这回它倒是道家。”克尔凯郭尔在19世纪后期西方现代主义思想背景下表达了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通过“丑角”与“看客”,刻画了思想家所认识的世界是那么的荒诞和虚无,但鲁迅并没有延续其非理性主义的逻辑,而是回到了民族现实生存环境中,对“丑角”加以改造,变成了他所倚重的“告警者”。

“告警”理论与鲁迅早期的“铁屋子”理论相比,后者还仅仅是强调先觉者精神独醒的苦痛,是一种从沉默历史中抽象出的社会本质,“告警者”则多了一重现实危机感,面临双重困境:其一是不能将真相使大众知道,其二是自身的道德品行受到诬蔑。“告警者”鲁迅的时代角色更清晰,对帮闲者和民众的心理距离和态度立场均有区别,而非单以“庸众”统称。同样是“面子”问题,鲁迅的剖解思路就呈现出与早期的差异。他说“面子”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sup>[3]</sup>,前清时候,洋人霸占中国利益,衙门失了“面子”,临走从边门送洋人,不给他走正门,大官们就“占了上风”。这个“面子”博弈暴露出典型的中国文化心理:第一,“面子”是所谓“脸”,代表一种身价,即一种价值观;第二,价值观受人的社会属性影响,阶级社会里面每个人的社会身份决定社会属性;第三,不正常的外在等级划分成为公认标准,内在的个人主体性就会丧失。因此,“要面子”必须分清究竟是个体本性尊严的需要,还是不平等社会附加的虚荣的欲望?这个牵涉到“尊严”的面子问题,本质上是人的平等和自由的体现,然而精神性的痼疾和社会性的时疫共同作用,酿造了中国人“名实观”的颠倒。鲁迅还进一步警告对“名”的过度强调,必然忽视基本的是非判断。针对有人指出“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罚钱”,“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鲁迅说“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

[1]鲁迅:《〈守常全集〉题记·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9页。

[2][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陈俊松、黄德先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6页。今译本为“在一家剧院,后台碰巧起火。小丑忙出来告诉观众。观众却鼓起了掌,以为他在说笑话。小丑又警告了一次,观众却笑得更欢了。我想,在那些以为是玩笑的智者们的呼声中,这个世界将会完蛋。”

[3]鲁迅:《说“面子”·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菜”,与其看重是否和“鸡鸣”同等重要的名声,不如“合群改革”<sup>[1]</sup>。这样的论调立刻引起了华人不满,林默认为鲁迅不但反对“鸣不平”,而且还说中国人不争气,不同意中国人仇恨西洋人,助长西洋人对中国人的欺压,鲁迅维护他“东家”的“花边文学”简直是“毒汁”、“妖言”,可见是称职的“买办”<sup>[2]</sup>。“告警者”看到的是民族生存力应该强化,应该把握自身命运,而不是麻木地接受恩宠或者剥削,宣扬的是抗争,抨击的是顺从,帮闲者们却以民族气节这样的道德判断来检讨鲁迅。由此见出,“告警者”与帮闲者最大的差异不在于所谓的民族大义,而在于“告警者”不以表面的是非来衡量事理的正误,这也是“告警者”始终逆舆论而行的原因。有怎样的阶级理论就会指导怎样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相比思想革命获得了更大多数的社会力量,这种进步性是这一阶级理论所创造,但止步于革命本身,抑或陷于革命运用的主义则会导致革命的不彻底。换句话说,在鲁迅的思想认识中,社会结构的革命和精神结构的革命并不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模式,上海时期的社会情势和鲁迅自身的反思更平衡了二者在鲁迅内心的比例。所以,“告警”必然是兼顾两个方面的失调,如果把鲁迅在三十年代坚持的精神进化说理解为是“错位”,那么,就无法看到鲁迅在阶级观视阈下个人意识的整合,充当“告警者”,恰恰是鲁迅以个体生命实践阶级理论的方式。

走上“告警”之路,鲁迅把唤醒沉睡国民的意识进一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革命任务,但这一任务与所谓的革命宣传却背道而驰:胡适称赞洋式的“模范监狱”显示人权的进步,鲁迅说国家“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若谷批评文人的不良嗜好,鲁迅说更糟糕的是这类“文人无行”的文章造成了文坛的虚滑;《大晚报》上夸耀“大刀队”与满洲军搏杀获胜,鲁迅说“我军”与“敌军”均为华人,正是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手段;抵制租界内洋人对国民的欺压和侮辱成为主流时,鲁迅说租界内“推”、“踢”、“揩油”、“爬和撞”、“冲”才是导致社会落后与混乱的原因;提倡国货,禁用“铅笔和墨水”,鲁迅说真正的爱国当如日本一样“仿造”优品……“告警”并非从优越性出发,而是有预见性地从貌似圆满的、正义的、积极的事件中看到被有意弱化或无意忽视的紧要之处。这一辩证思维来自于身体力行地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战斗实践,同时,又不局限于阶级论的唯物史观。“告警者”逆求真谛,在于批判立场的介入,尤其是对同一阶层的警示。知识者参与革命依靠手中的笔,但文人对个人职业和民族事业关系的认识还是容易走到原先的路子上,特别是有了“革命”的幌子后,这种偏离不易察觉。鲁迅指出有些人“自己替别人给自己作序”藉以吹捧,以“逃名”标榜自己澹泊,根子在“名”;有些人以广告造势宣传售书,“商定”的文豪,“商贾”的批评,根子在“钱”;更有借从文以“进大学,进衙门”做“文官”;甚或还有“文丐”、“文氓”。1935年,鲁迅先后写了七篇杂文论“文人相轻”,不断完善自己关于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祛除奴性,从事精神建设工作,成为社会良心的认识。

要使“告警”具备真正的警示作用,首先,“告警者”不受任何利益驱使,只对真相负责,鲁迅对自己的文字便“不求保护”,一是不需要受到言论检查制度的保护,因为他的文字只能成为投枪和匕首,二是不需要受到历史流逝淘洗的保护,因为社会若是抛弃了恶疾,他的文字就自然死亡,因而鲁迅始终带着人本的理念、民众的立场、独立思考的精神面对“荒淫与无耻”,从事“庄严的工作”。其次,“告警者”要有理性的判断能力,不能为“告警”而“告警”,应有相应的目标和策略。答国际文学社问时鲁迅说这种“工作”包含建设和战斗,但现阶段还是“以战斗为主”,为底层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而战,为革命艺术的纯粹和进步而战,为社会公共空间的自由和平等而战。其三,鲁迅的“告警”有着内在的批判动力,即用自由的批判去获求批判的自由,如果以自由为名的革命,仅仅是“向左转”,自由就会成为“保障复辟的自由”,“屠杀大众的自由”,导致“自由”成为一个伪命题。在此逻辑下,鲁迅也指出个人主体性自由的实现必须由“心”来完成,所以反对“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的统治。最后,鲁

[1]鲁迅:《倒提·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页。

[2]林默:《论“花边文学”》,1934年7月3日《大晚报·火炬》。

迅的“告警”还有终极目的,他多次探讨国民“难行与不信”的问题,说大多数的人有“信”,但很少“坚信”,既相信命运,又想着“买奖券”、“推背图”这样改变命运的旁门左道,根本上还是“什么都不信”。他说“怀疑”并没错,但是流于“怀疑而已”,却无“明断”,这就是缺陷。从本质上来说,怀疑与崇信并不矛盾,怀疑是找寻崇信的有效路径,但不能是绝对怀疑,否定一切,而应该是既辩证又唯物地看待进化历程中的阶段性和整体性。这样的“告警”认识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情状,洞悉了世俗流弊背后的文化逻辑,形成新的文化批判力,与三十年代初刻板的无产阶级理论和教条区分开来。

“蝙蝠”、“勃兰特”和“告警者”三种意象的产生,同鲁迅在上海时期接触的社会情形、思想生态以及个人的精神结构调整密切相关,它们作为鲁迅自我评价的一种符号化体现,客观上也是鲁迅为文行事的参照与要求。三个意象前后相继出现,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生关系:从“蝙蝠”洞察黑暗的独特方式,进而引申出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从“勃兰特”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得出革命手段的运用原则;从“告警者”参与革命的动机和行为,看到革命队伍建设的危机,三个方面共同形成鲁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个性阐释。同时可以看到,如果单独地理解其中一个意象,或以为鲁迅只延续进化理论的精神革新,或判断鲁迅以阶级的改造替代国民性的改造,都不能完整地把握鲁迅的变化。对照《热风》、《坟》和三本“且介亭”杂文集,鲁迅的文字越来越“务实”。他在《“立此存照”(六)》借罗振常《流寇陷巢记》一段故事,说“《热风》中有《来了》一则,臆测而已,这却是具象的实写;而贼自己也喊‘来了’,则为《热风》作者所没有想到的”<sup>[1]</sup>,从“臆测”到“具象的实写”说明这一转变的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热风》的写作体验以十九世纪末期为主,而《立此存照》的作者已经目睹了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历史变化,当压迫、杀戮和麻醉从潜在的预期日益显形,且成为时代的主体事件,世变之亟超过一切的精神虚拟构想。一言以蔽之,生活的残忍已经大大胜于人性的推理假设。鲁迅早期的信仰建立在他作为个体对历史经验的认识以及域外思想资源的刺激之上,而伴随实际斗争的加剧,他的生命体验中融入了底层百姓的阶级迫害感,并且看到这种战斗的严峻性和持久性。他希望通过社会阶级的废除来实现国民精神的进化,同时,又试图以国民心灵结构的改良来促进社会阶级的平等,这就保证了他信仰的某种连续性。他的问题意识和思维逻辑都有着承续和联系,同样是对“吃人”社会的揭示,三十年代的“吃人”更实在,指明舆论的自欺欺人,“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对历史的批判引导走向生存问题;同样是“救救孩子”,三十年代提出了孩子的“玩具”问题、“读物”问题、“连环画”问题等等,对儿童的认识由成人视角转变到儿童本身。他的立足点都回到切切实实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即使他惯用的讽刺也专门说明:要抱有“真实”和“善意”,即使“夸张”,也“不胡闹”,这就决定了鲁迅在上海时期的解剖和疗救都有明确的“治活”意识和“他者”观念,同他前期的精英化思路有所区别。

鲁迅的“革命观”从文学革命期到社会革命期越来越辩证,也越来越具有大众化风格,与他重新接触、认识无产阶级有关,但他所信奉的进化观为基础的尼采主义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三个意象正好能反映出鲁迅这个时期个人精神的内在坚持与重构,无论是突出民众感知的阶级立场,正视黑暗、揭露现在,还是对文字工具以及翻译理论的强调,身体力行从事文艺基础工作,或者在革命阵营内外实施文化批判与思想改造,都紧贴着精神进化的伏线,而这也恰好是鲁迅在上海阶段革命观的形成逻辑和推动力量。无产阶级革命的情感态度和意志倾向并非生根于舶来的理论学说,而是有本土的经验和生命的体验做积淀。在这个层面上说,鲁迅以三个意象自喻,作为对在上海这块饱受凌辱与压榨的土地上经历中国最黑暗的“奴隶时代”的不懈抗争,既强化了革命观的内部张力,也巩固了个人信仰力的完成。

[责任编辑:平 啸]

[1]鲁迅:《“立此存照”(六)》,《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5页。